

区域与全球的互动

——明代至民国的中国东南文学考察

苏文菁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区域与全球的互动

——明代至民国的中国东南文学考察

苏文菁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与全球的互动：明代至民国的中国东南文学考察/苏文菁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8

ISBN 978-7-301-16256-9

I. ①区… II. ①苏…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明代～民国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2826 号

书 名：区域与全球的互动——明代至民国的中国东南文学考察

著作责任者：苏文菁 著

组 稿：王炜烨

责任编辑：王炜烨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256-9/I · 217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7.5 印张 408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章 他者之镜	
——外国人眼中的福建形象	043
第二章 海洋文明	
——中国东南沿海的文化特征	119
第三章 新文学传统	
——传统资源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整合	209
第四章 东学西渐	
——向西方传播中国文明	335
索引	415

绪 论

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中唯一被水所覆盖的星球,也是目前已知唯一有生物体生命的星球。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源于水,水是所有生物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体中水占 70%。地球表面的 71%被水覆盖,其中的 97.2%是海洋。海洋与地表中的水蒸发到天空中形成了云,云中的水通过降雨落下来变成雨,冬天则变成雪。落于地表上的水渗入地下形成地下水;地下水又从地层里冒出来,形成泉水,经过小溪、江河汇入大海;这样形成一个水循环。人类文明的起源绝大多数都在江河流域。水孕育了生命,水滋养了文明。

中国东南沿海区域,北起渤海,南至曾母暗沙,是一个向西太平洋开放的、长达 19 000 千米的广阔的海岸线。海岸线外,还有宽广的大陆架和 5 000 多个大小不等的岛屿。在这些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远古时代人类海洋活动的诸多遗存。中国夏、商、周三代(前 2000—前 221)的活动中心是在黄河中游。与此同时,生活在亚洲大陆西岸的主要是两个以海洋为主要活动对象的族群:东部,包括现在的渤海湾、山东半岛、江苏北部的主要是“夷”;生活在东南、南方沿海,包括现在的浙江、福建、两广区域的是“闽”。“夷”经过商、周两朝的打击,其海洋性的区域文化消失得较早。“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多数区域,如两广的大部分地区、浙江,都在汉朝期间“消解”了区域文化的特性;而福建的漳州地区,直到唐朝中后期才被“征服”。所以,先秦的中国海洋活动其实只是“夷”与“闽”的活动;而且,“夷”、“闽”的海洋活动惯性一直是此后中国海洋事业的坚强支持。

百川归海,海洋更是人类活动的对象与场所。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重要部分。20世纪以来,人们在世界各地沿海区域发现了不少的贝丘遗址。这些遗址所展现出来的渔猎生活充分表明:原住民已具有典型的海洋行为(maritime activities)。我们认为在远古时代,由于不同区域之间交往的不便,人类大规模迁徙的困难,许多区域性文明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文明的多元状态。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中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各诸侯国由于所处地域的不同,早就有了不同的文化——风土民情。从多元文化的观念来看,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很难用单一的标准去度量,文化作为人类与环境长期磨合的结果,实难以“先进”、“落后”来定论。中国文化从源头开始就是认同文化差异性的。中华文化中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前11—前6世纪)是中国最后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周朝的产物,从现存的《诗经》305首看,占绝大多数的还是周朝各诸侯国和地方的乐曲(160首)。由此可以相信,在秦嬴政“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不同区域不仅早已形成各自的风俗民情,而且还得到“最高联邦政府”的关注——最高统治者将采集不同区域的民风作为了解不同区域民情的好办法。

我们认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不仅表现在文明发展与延续的长度上:她是世界四大文明源头之一,同时也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而且也表现在其丰富性与多样性上:中国领域的多样性从人类生存的最初就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从游牧文明到农业文明以及海洋文明的不同典范,这些“次”文明体系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更有意义的是,中华文明中的各种文明体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显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又共同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在中华文明的区域性个性里,如果说“黄河—长城”以北的区域呈现着典型的游牧文明的特色,并在中国历史上表达了中华民族溢出单一的农业文明的生活形态,那么,东南沿海区域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就以鲜明的海洋因素在中华文明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今天的世界是近五百年来人类海洋活动的结果。16世纪以来,欧洲人的航海突破了大西洋的局限,与亚洲在太平洋上相遇,由此拉开了人类全球化活动的重要序幕。从海洋文明的视野看,海洋并不是人类交往的阻隔,而是人类

交际更大的通途。我们极为重视人类在陆地上的迁徙与交流活动,也更应该给以海洋为媒介的人类交往以足够的重视。

从这样的文化视野出发,我们对“历史”的“断代”即是以人类对海洋的作用程度,人类以海洋为媒介产生的交流、交换、碰撞、征服、融合的过程与程度为基本的依据。以此,从中国文化发展的立场出发,我们将远古至20世纪上半叶的以海洋为媒介的文明交往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远古至16世纪,人类对海洋的作用能力尚处于近海航运、近海捕捞的状态。与此能力相结合,海洋对于人类大规模的交往起着一定的阻隔作用,虽然我们并不排除人类在一定的海域范围内形成了小规模海洋文化圈,就像远古时代的地中海文化圈、印度洋文化圈、北冰洋文化圈、南中国海文化圈的形成一样。近海梯度航行可以在一定的海域内形成规律性的交往,进而形成文化共同体。从8世纪开始,以阿拉伯人为主,编织起了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之间的航线,将印度洋文化圈与南中国海文化圈联系在一起,在陆地的“亚洲”之外,构建起海域上的“亚洲”。但是,我们知道,海域的特色是无疆界,我们人为地划分了“五大洲”、“七大洋”;大部分的“五大洲”为海域所分割,而“七大洲”却从来都是一体的。一直到16世纪之前,人类对于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以及跨越太平洋的航路都没有完成。人类由海洋网络编织而出的全球化格局的形成,还有赖于人类对造船技术、航海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当然,更有赖于人类对“海外财富”的欲望的膨胀。这是我们将远古至中国的宋元时代列为人类以海洋为媒介的文明交往的第一时期的依据。第二时期,16—19世纪,大约中国的明清时期。从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立场看,这是一个人类终于可以将“海洋变通途”的时代。欧洲人自豪地将之称为“地理大发现”,欧洲各殖民国家通过海洋网络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海外殖民扩张以及文化输出。而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中央意志与区域的民间选择开始背离与冲突的时代。中国明清两朝中央政权囿于极端保守的立场,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面前关起了国门,厉行禁止个体海洋贸易的“海禁”,以及一系列诸如驱逐传教士、迁界封海等拒绝与世界交往的政策。以福建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从区域的文明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台湾、下南洋、走西洋、去东洋,代表亚洲之中国继续参与世界文化与经济的大循环;同时中国海商持续、大规模的海洋活动必然造成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迁播。第三时期,1840—1940年,

欧洲携工业革命之技术优势与启蒙运动之制度优势,以铁甲船取代木质帆船,不仅通过海洋争夺形成了今天世界的基本格局,同时将欧洲这一特定区域的文明形态“演变”为全球普适的普遍规律。欧美的“话语”作为“世界语”而世界通行,只要是“欧洲”的就可以冠以“世界”的。就中国的文化形态看,中西之间的文化也从“对立”、“并行”之形态转变为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的时代。

一 以海洋为媒介的文明交往: 远古至宋元

早在人类文明的萌芽时期,我们就感受到了东方与西方文明的相互倾听。古希腊神话传说告诉后代:在极远的美狄亚的故乡的国宝是“金羊毛”;维吉尔的《农时》诗歌里告诉罗马人:远方的“赛里丝”(Seres)国度,人们是用金剪子收获金羊毛的。这是我们所见到的西方文明较早对东方中国的“想象”。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人是如何获得中国的丝绸,并以此为核心展开了一系列对中国的想象呢?至今考古学与人类学给出的合理的解析就是:古代居住在中东的人民是东方中国与西方欧洲的中介^①——物资与文化交易的中介。在甘英出使大秦(中国汉朝称罗马为大秦)而不得的具体经历中,后人还是获知中东部族对这条商路的垄断意识。^②其实,从远古到纪元前后,东方与西方都在努力走近对方。就在中国的大汉王朝要向西边拓展空间的同时,罗马商人马埃斯·蒂贤奴斯也派出代理商前往远方的“丝国”,并写下了游记,虽然原书已逸,但相关的内容还是在托勒密的著作里保留了下来。他们虽然不能确定“丝国”的具体位

① 参见[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5—59页。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光学家。地理学在古希腊相当高度的发展。而到了托勒密生活的时代,罗马人的世界性大帝国大大增进了欧、亚、非三大洲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流,无数军人、官吏、僧侣、商人、各色人等的远方见闻,正有利于古代地理学向一个新的高度迈进。托勒密的《地理学》代表了当时欧洲人对世界的地理的最高知识。

② 据《后汉书》载:和帝永初九年(公元97),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海中善使人思慕乡土,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置,但是“在亚洲极东的海岸上”是他们的描述。这个盛产“金羊毛”的“丝国”^①在古代欧洲又有了其他的称谓。

关于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应该有海路与陆路两个不同来源的名称。就像英甘在安息(巴比伦)人的“恐吓”之下放弃了渡海的计划,理由就在《晋书》卷九七中,他说:途经大海,海水苦咸不可食。这一定是一个出生于内陆、生活在内陆的人的生存知识,在熟悉大海的沿海民众那里就未免荒唐了。Seres(赛里丝)一词来自陆路,是途经中东的陆上贸易之路产生的命名。稍晚,又出现了(秦)Thin,或 Chin,或 China,这个称呼来源于海路,是经由海路从南部的印度支那半岛开始的对中国的称呼。^② 中国广大的国土以及由欧亚大陆向东延伸到海的格局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就必定具备两种不同的与外界交流的路线:海路与陆路。

就中国东南沿海的区域文化而言,福建无疑是核心的代表性地区,这也正是本书主要以福建的人与事为代表的原因。有文献记载以来,福建就是中国历史上由海路实现对外交流的典型地区。^③ 至汉代,福建区域的海洋性文化特征由于闽越国与朝廷的交恶而凸显了出来。我们从《史记》的多处记载中都看到了中央王权对古老之“闽族”^④的“防范心理”。汉在建国之初,就将原来的“闽”一分为三。海洋子民的扩展个性与海洋贸易所带来的财富结合在一起,这才构

① 中国文字中“丝”以及“丝”之变体、如“走丝旁”等,都是中国汉字字体的重要构成部分,以其为偏旁的汉字数量不在少数。

② 参见[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0—61页。

③ “福建”在此的指称并不仅限于地方行政区的概念,而是中国东南沿海北起长江流域边缘的杭州湾、南到珠江流域北缘的韩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该区域与台湾海峡东岸的台湾岛无疑是中国海洋文明最为典型的代表,该区域的海洋性文化特征源于地理环境、气候、族群、时代等因素。相关论述可参见拙著《福建,世界海洋文明发源地》,美国强垒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卢美松:《闽中稽古》,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2—112页。2009年5月,中国中央政府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意见》中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正是源于这样的区域文化共同性。

④ “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族群之一,在西周之《周礼》中就是一个与“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共同组成了中华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今天,我们已经难觅“夷”、“蛮”、“貉”、“戎”、“狄”等族群,而今天的福建人就是远古时代“七闽”的后裔。

成了“富可敌国”。^① 三国时代,福建从长达 288 年的军事管制下进入了吴国海军与船舶基地的时代。一直到唐朝中叶,由于怛罗斯战役(751)的失利与“安史之乱”(755—763)的爆发,由汉朝拓展的、连接东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被截断。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由黄河中、上游开始向东、向南转移。地处东南的福建逐渐走入中原文化的视野。在文化上,这块浸透着海洋咸湿气味的土地重新被中原、北方所命名——从歧视性的“闽”到祝福性的“福”与“建”。“福建”、“福州”之命名源于天宝年间。^② 福建人是“有文化的”概念的获得也从福建籍的第一位进士薛令之(706)开始。有唐一代,福建逐渐形成了沿海经济文化带,并初步出现了以三个主要河流入海口为中心的繁荣区:闽江入海口区域、木兰溪入海口区域和晋江入海口区域。^③ 就中古时代世界贸易网络来说,7 世纪以来,中亚的阿拉伯人迅速崛起,从大西洋、地中海到东方的印度洋、太平洋,阿拉伯人建构起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中国东南沿海包括福建人都积极参与其中,特别是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构成的东方海洋贸易网络中,福建人的作用举足轻重。其对福建本土发展的促进结果是:福建沿海经济从海洋捕捞型为主向海洋商贸型为主转变。这对于强化自古以来的福建经济文化的区域性特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成为构建中古世界海洋贸易与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唐末王氏闽国能够在福建统治长达近一个世纪、在五代十六国中成为强国,不能不说与王氏集团充分利用福建的海洋文明特性有相当的关系。

① 汉初,中央王朝即将秦之闽中郡一分为三:福建封给了闽越王无诸,浙南的温、台、处封给东瓯王摇,闽粤交界处的潮、汀封给南海王织。三国中闽越国发展最快。汉文帝初年,南海王反汉,败,举国被迁往江西的上涂(《汉书·严助传》),南海之地归闽越所有。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举兵攻东瓯,东瓯向朝廷请旨,举国 4 万多人迁庐江郡。东瓯地盘为闽越所占。闽越国这种征战的国力来源于海洋军事与贸易的力量。闽越国的余善于公元前 111 年举兵反汉。闽越人敢于和朝廷对抗,除了其海军力量与经济实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对海外交通与地理环境的娴熟。早在建元六年(前 135),余善在其兄郢发兵反叛朝廷时就说:“……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史记·东越列传》)。可参见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1—3 页;林翔瑞等:《福建简史》,北京:国际华文出版社,2004 年,第 31—37 页。

② 参见林翔瑞、刘祖睦著:《福建简史》,北京:国际华文出版社,2004 年,第 60—61 页。

③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宋代闽北区域文化的发达造成了“闽文化的发端在闽北,并由闽北而闽东、闽南、闽西”的“假象”。从唐朝福建的经济与文化——主要以科举为例我们可以看出,福建的经济与文化的繁荣都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支持有关。到了唐晚期更是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变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唐朝福建沿海经济文化带的形成,参见《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林拓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第 30—39 页。

宋代对于福建的独特意义史家多有论述,同时宋代也是福建的海洋文化特性彰显的时代。^① 宋代的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开洋裕国”为国策。宋朝最高统治者认为:“市舶之利最丰,若措置合宜,所得辄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任何一种国策的实施都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过程。福建的区域海神信仰最具有支撑“开洋裕国”的文化精神素质,福建的海神妈祖被册封为国家神祉(1156)。从宋朝开始,以福建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区域文学出现了与海洋文明发展相关的、独特的内容——海外交通、世界地理、异国风情。时任福建路市舶提举(设泉州)的赵汝适,在泉州任职期间常阅诸蕃图,求询外国商贾和水手,根据得知的各国国名、风土、山泽、物产等情况,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撰成《诸蕃志》。^② 该书成于宝庆元年(1225),所记海国很广,东自今日本,西抵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沿海诸古国几列举无遗。书中对北非、东非的记载也相当详细,此书是有关宋代海上交通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边疆与域外地理著作。如果说宋朝是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使得中国传统的对外陆路交通几近断绝,而海外交通显得特别的重要,那么,元朝不仅重建了汉唐以来统一的中国,而且将版图几乎扩展为整个欧亚大陆。雄心勃勃的元朝取代了阿拉伯人的地位,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贸易国家。福建民众从事海洋贸易活动的情况早在苏轼(1037—1101)的《论高丽进贡状》中就有所记载:“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大规模、持续的海洋贸易活动自然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国传统的汉语诗歌中出现了不少描写福建沿海港口城市与海外各国繁荣的贸易现象。如南宋寓居泉州的李文敏称赞泉州港是:“苍官影里三州路,涨海声里万国船。”谢履的诗有:“隔岸诸番国,江通万粤州。”南宋中期出任泉州知府的王十朋更有“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的诗句。除了诗歌中增添了这类吟咏“帆船”、“商贾”的意象之外,在中国传统的官方史书之外多

① 汉语典籍中宋代的各种统计与资料都说明福建文化、经济地位的显赫。《宋史》“儒林传”和“道学传”载福建籍人17名,居全国第一。宋朝进士总数约为28900人,福建籍约占五分之一,为全国第一。《宋元学案》中立案学人988人,福建籍178位,全国第一。

② 赵汝适,相传为太宗八世孙。曾任卿、监、郎官等。嘉定(1208—1224)至宝庆(1225—1227)年间任福建路市舶提举。1225年,以任内采访所得,撰成《诸蕃志》2卷。上卷记载东自日本,西至北非的摩洛哥共50余国的概况。下卷记载物产,以物为纲,具述产地、制作、用途及运销等。末尾附《海南地理志》。是研究宋代海上交通、对外贸易以及与各国友好交往的重要文献。原书已佚。今本辑自《永乐大典》。近人冯承均有《诸蕃志校注》。

了区域与全球互动的知识结构,宋朝的《诸番志》,还有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都是这一类的世界地理文化书籍。

人类海洋活动所带来的文化交流活动历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从唐末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参与建构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洋贸易网络开始,一方面是阿拉伯人在福建港口城市形成了“离散族群”(diaspora)^①;另一方面是以福建人为主的中国东南沿海民众也逐渐在海外形成了“离散族群”。关于阿拉伯人在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所形成的“离散族群”,最典型的莫过于在泉州形成的阿拉伯人“离散族群”。由于福建沿海是中古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上的重要一环,阿拉伯人到泉州港经商、传教与游历的人员多达数万计。当地政府就在城南便利船舶出海处设立“番坊”^②,建立“番学”,甚至产生了像蒲寿庚家族那样控制泉州、福建,乃至决定宋元改朝换代时福建之色彩的阿拉伯裔商人。元代的泉州还是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二大传教区(最大的传教区是当时称为“汉八里”的北京),来自意大利的方济各会在泉州活动了60余年,留下了像《鄂多立克东游记》^③、《马黎诺里游记》^④等反映当年福建与欧洲交往的著作。今天,泉州地面与出土文物都保留了诸多当年中东阿拉伯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与中华文化交融的遗产。在世界文化典籍里,除了有马克·波罗不朽的《游记》,近年还出现了更为不朽的《光

① “离散族群”之英文源于希腊文,本指纪元前被掠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研究非洲土著的人类学家首先使用该词意中“脱离故国”这一含义,用来说明跨文化、跨部族的贸易网络的形成方式。“离散族群”是一种嵌入寄居地社会的暂时性或永久性的聚众。对于寄居地而言,“离散族群”的成员是外国人或外地人,是他族。离散族群内部具有相同的、独立与寄居地的自我文化认同。来自同一原乡或同一国度的人,一方面保留了原乡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学习寄居地的部分文化,首先是语言,因此,“离散族群”的成员能够承担原乡与寄居地之间的文化中介。“离散族群”成员的生活形态就是比较文化、跨文化研究的最好范本。同一原乡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异乡分别建立“离散族群”,而这些分散开来的“离散族群”因为分享相同的原乡文化,所以不难串成一条条跨越空间的人际网络。有意义的是,哪怕与原乡失去联系或者原乡已经消失不见了,“离散族群”的网络运行是不变的。

② 参见[日]桑原骥藏著:《蒲寿庚考》,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47页;《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林金水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2—45页。

③ 鄂多立克(Odoric, 1286—1331),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教士,也是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他于1316年开始周游世界,1321年经海道至中国,游历泉州、福州。1328年启程回国。回国后,他口述见闻,由他人记录为《鄂多立克东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中国内地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何高济翻译的版本。

④ 马黎诺里(Marignolli, 约1290—?)是天主教教皇派出的最后一位出使元朝的使节。他出使回国时由泉州出海,回国后将其东行历程收入其撰写的《波希米亚历史》(1354年)一书中。19世纪初,德国人梅纳特将这一部分辑出,即成今天的《马黎诺里游记》一书。《马黎诺里游记》对泉州颇多记载。该书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典之作。

明之城》^①。

只是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这些都是序幕。

我们从沉重的明朝开始。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人民来说,有明一朝是悲情的时代,宋元时期中国在海洋上的业绩,以及由此积累起来的海洋知识、造船能力、海洋经贸网络等,我们能够称之为“海洋文化知识”的东西在明朝的官方层面重归于零。历史的航线在这里进入了一个逆转的漩涡。不知道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偶然错误地选择了一个不具备舵手素养的朱氏家族来做这艘庞大航船的领航人,还是中华帝国命定开始了漫长的衰败过程。15 世纪初的 1402 年,中国明朝的第三任皇帝朱棣即位——朱氏家族里或许只有朱元璋与朱棣具有“王者之像”,三年后,他开始了一项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洲际大航海活动。10 年后,1415 年,地处欧洲最南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国王洛奥一世(1385—1433)和他的小儿子亨利(1394—1460)带领舰队进抵北非,将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的休塔城(Ceuda)建成欧洲人沿北非西海岸南下的据点。这两位野心勃勃的君王所做的事情是否向历史暗示着:东方与西方在海上就要相逢了呢?只是对于明朝来说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故事的谜底。那么,欧洲人呢?就在东方的中国皇室结束了下西洋的大航海那一年——1433 年,葡萄牙人在非洲西海岸上向南不断延伸航线,就要征服今天的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了。亨利王子创办的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所航海学校,这一创举为葡萄牙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海洋强国积聚了人力资源。几代葡萄牙人的努力终于铺就了迪亚士(Bartholomew Diaz, 1450—1500)于 1488 年越过非洲最南端进入印度洋的航线。1498 年,葡萄牙王

^① 2005 年,国际汉学界爆出一则新闻——1271 年 8 月 25 日,一名叫雅各·德安科纳的意大利犹太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城市——刺桐港(即今天的泉州),在这里度过了充满传奇色彩的半年时间,并用古意大利文写下了厚厚的一部刺桐见闻录。700 多年过去了,历史进入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一位英国学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了这部手稿,并把其译成英文,取书名为《光明之城》。消息传出,轰动于各国学术界,同时也引起一场真伪之辩。美国一家出版社原定于 2006 年 11 月出版这部译作,由于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伪作,而取消了出版计划。但英国的一家出版社还是出版了《光明之城》,书的封面上写道:“在马可·波罗之前,一位意大利犹太商人冒险远航东方,他的目的地是一座中国都市,称做光明之城。”《马可·波罗游记》是第一部欧洲人撰写的向欧洲乃至世界介绍中国的见闻录。但是,这部游记的真伪问题已经争论了数百年,至今仍有不同说法。如果《光明之城》确系真迹,势必动摇《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地位,而且对研究中亚历史和中国 13 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中外交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光明之城》的真伪问题是当今国际汉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面对这样的一个“热点”,我们首先要问的应该是:今天的欧洲为何还在记忆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城?

室派遣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9—1524)率一支准备已久的探险队于1497年进入印度洋。同时,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另一个国家西班牙也加入了海洋拓展的冒险事业之中。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1474—1504年在位)与意大利人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签立了《圣大非协议》。哥伦布不仅获得了女王出售自己的首饰筹集来的资金,还获得国王签署的护照与三份国书:一份是准备好的、呈给中国“大汗”的;其他两份是空白的。哥伦布没能把这封国书呈给中国的“大汗”,他把加勒比区域当做亚洲了。那一年是1492年。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都想通过海洋独霸“世界”。在教皇的调停之下,出台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瓜分世界的条约《托尔德西拉斯(Tordesillas)条约》:子午线以西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以东是西班牙的势力圈。

如果哥伦布真的来到中国,又会是什么情景呢?在他们的想象里,中国还是那个马可·波罗笔下的财富之邦:政府开明,人民富足。

在地球的东面,大中国的明朝对这些资讯不了解,即使了解了,相信皇帝也是轻蔑地一笑:“尔等小国!”明朝自洪武七年(1374)关闭浙江、福建、广东市舶司,厉行阻止个体海商进行海上贸易的海禁以来,有明一朝276年,海禁是作为明太祖的“祖训”代代坚守的。前期只是朱棣在朝的20年间稍有“驰”动;后期却直至隆庆元年(1567)才开放福建漳州月港的私人贸易,在诸多限制之下“准放东西洋”。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东南沿海商人个体的出海经商活动都是“违法”的。在朝廷文献里,个体出海经商者就是“寇”与“盗”;另一方面,明朝还保留着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官方”“朝贡”关系,维系着一定程度的朝贡贸易活动。此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海事活动——“通琉球”与“下西洋”都利用了福建人传统以来的海洋文明的结果:木质帆船时代的航海技术与造船工艺,对海外航路网络的掌控,以及不可或缺的海神妈祖的信仰支持。

二 以海洋为媒介的文明交往:明清时期

无论是必然还是偶然,中华帝国的大明王朝表现出了一个国家政体停滞、

衰败与了无生机的气象。但是,我们必须以明朝为观察的起点,以民国初年为终点,这是一段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文化惊心动魄的交往阶段,是中华古老帝国开始停滞至最后的奄奄一息的衰败过程。古老帝国的停滞,鲜明地表现在国家统治意识形态与民间区域社会发展的不协同性上。^① 明清两朝的国策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突,那些“国策”严重制约、阻碍,甚至断绝了东南沿海的发展。中华文明中的海洋性发展力量被代表着内陆文明中极端保守力量的明清两朝所覆盖、扭曲、扼杀。对于中国的海洋文明而言,明清两朝的历史就是中国海洋文明不断被边缘化甚至“失语”的历史。以福建为中心的东南沿海民众的海洋行为不能见容于明清两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成为欧洲东来的殖民者了解中国的第一个样板与第一扇窗口。^② 我们需要借助他们的记载来补缀、链接中华民族的海洋文明片段。假如,此际的世界形态还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阶段,历史还可能允许我们的祖先慢慢地调整、适应。遗憾的是,世界其他区域的文明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新兴的资产者努力挣脱“封建”与“宗教”的枷锁,用枪炮与各种世俗力量塑造了个人权益的理念。这种注重个人在世俗社会中价值的实现、尊重个人的才能及其所得,是欧洲发展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这种理念从人的思想上解放了生产力,为“工业”与“技术”奠定了生长的土壤。我们从16世纪以来欧洲各老殖民国家的海外扩张中,就能感受到这种文化理念对国家意识形态与普通民众的精神意义:使之上下齐心,实现世俗生活中最大的国家荣誉与个人利益。因此,欧洲各国的海洋贸易就不仅仅是个体商人的事业,而是国家的利益与上帝的荣耀。王室成员参股、国王积极支持是欧洲各国发展海外事业的正常形态。就在这种差异中,中国与欧洲的社会形态向“剪刀差”之状态发展,直到20世纪末,中国“这只睡狮”开始警醒。

① 如果说明朝在政权建立的初期实行禁止私人海洋贸易的“海禁”有其控固政权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以实行“海禁”为一代明朝的“祖训”,则是对历史潮流的违抗。统治者实行的“国策”不能做到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是国家、人民的灾难。清朝在对外关系上继承了明朝的衣钵,而且比其更为“坚定”与“彻底”。我们从明朝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以生命为代价“犯禁”下海、贩洋海外、武装反抗“海禁”的事实中可以总结出这点。

② 参阅苏文菁(苏西):《闽海传奇录——闽、闽商、闽文化》,载《管理与财富》2004年第5期,第27—34页。

选择“明代至民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还由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当代的全球格局是由16世纪以来的各国对海洋势力的争夺而形成的,这种争夺既是军事的、政治的,又是经济的与文化的。与人类传统的以陆地为交锋主场不同的是:它们以“海洋”为载体,其独特性是不言而喻的。第二,16—20世纪前半叶,欧洲文明在“坚船利炮”^①的帮助下,野蛮地“征服”了全球范围内其他形态的文明。只有在中国,中国完备的文明形态及其国家政治制度迫使欧洲人开始思考不同文明的价值与意义。在明朝,最早进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无不采取“适应”政策。由于天主教不同教派之间的文化策略不同而产生了意义巨大的“礼仪之争”,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福安恰恰是“礼仪之争”的发源地。^②第三,中国传统之“中央大国”的观念第一次受到了挑战。由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里,在已知世界范围中不存在可以抗衡的对手,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③从纪元前的商周至19世纪一直得以存在,其中又以明朝时期的朝贡体

① 为“坚船利炮”加上引号,是因为我们认为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有自己完整的文明形态,且幅员辽阔的国家,是不可能仅仅败于技术的。“坚船利炮”所表现出的“技术至上”的观念,以及将文化与技术相分离的做法,说明了我们文化自省能力的却失。

② 明末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采取迎合儒家思想的“适应”策略,方法之一就是允许中国信徒祭祖祭孔,但是,随后进入中国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对耶稣会的“适应”策略有不同看法。一方济各会士在向一王姓福安信徒学汉语时,王姓教徒将“祭”等同于天主教的“弥撒”,由此拉开了东西文化“礼仪之争”的大幕。参见林金水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5—268页。

③ 朝贡体系由“外交”与“贸易”共同组成。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的定位。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主体,故自称“中国”、“中华”;而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与国家都是蛮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被限定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朝贡外交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并不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因而,在政策导向上则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在实施过程中,便形成了一个定式:凡肯朝贡的国家、地区、部族,不论远近,不论是否有过恩怨前嫌,一概慨然接纳;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在这一外交政策下,中国王朝的对外交往不仅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反,还以经济的付出换取朝贡礼仪的名义。所谓朝贡贸易,就是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进行交换的贸易方式。在中国古代,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着礼物的“交易”。明清时代,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朝廷仍然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方面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中;另一方面,继续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如明朝即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这样的朝贡贸易自然会使各国纷纷来“贡”,其结果则是明王朝“岁时颁赐,库藏为虚”。只好对来贡者的时间、次数加以限制。如明朝对安南即规定三年一贡,使者不过三四人,但安南却总是提前来贡,人数与贡物也超出规定,其目的当然是要借“朝贡”之名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